

“留学界之大敌”吴嘉善的再评价

——兼析容闳与吴嘉善之冲突

李 志 茗

吴嘉善曾担任晚清幼童驻洋肄业局委员。在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(中译名为《西学东渐记》,直译为《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》)一书中,容闳极尽辱骂之能事,痛斥他为“留学界之大敌”,“丧心病狂”,“只宜置之疯人院或废病院中”。^①由此滥觞,研究者们人云亦云,因循陈说,想当然地视吴氏为食古不化的顽固派,指责他是幼童留美计划夭折的罪魁祸首,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破坏者。

实际上,吴嘉善并非千夫所指的那种可憎可恨的守旧人物。笔者努力爬梳有关史料后,发现他是一位思想开明、颇具个性、较有作为的传统士大夫,居京师期间,有惊人之举——放弃唾手可得的功名利禄,埋头学习外语,研究算学;逗留长沙时,遍交算学名家,从事畴人之术,著述多达二十余种;南下广州后,投身于清政府的教育事业,先是降尊屈驾执鞭广州同文馆汉文教习,后则不顾花甲之年,应召远赴异邦管理留学幼童。

可是,他刚刚走马上任,容闳就惊呼:“留学界之大敌至矣!”^②讥贬他是学不成器、能力平平的庸人;诬蔑他是仇视驻洋局和留学生的反对党,无时无刻不捕风捉影,散布谣言,刻意诽谤,最终导演出驻洋局遭解散、留学生被裁撤的恶剧。这些言论事实上歪曲了吴嘉善的形象,实为无稽之谈。因此,有必要勾勒出吴氏的庐山真面目。

晚清第一位学习外语的翰林

吴嘉善(约 1819—1885),字子登,江西

南丰人。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乡试中举。咸丰二年(1852年)恩科“进士出身”,并考取馆选庶吉士。次年散馆时,吴嘉善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,授为翰林院编修。入翰林院,是进士金榜题名后最清要的出路。一甲的前三名通常直接授予翰林院修撰和编修,二、三甲进士往往要进行一次“馆选”,考中的才有资格入散馆学习,为将来步入翰林院奠定基础,其他的则分部主事及内阁中书用,或者下放到地方任府推官、知州、知县等职。庶吉士学习期满,先要考试,然后散馆。成绩优秀者留翰林院为编修、检讨;次者改给事中、御史、主事、中书、知县等职。因此,每科仅二、三十人能够荣膺“翰林”称号,实在可说是精英中的精英。梁启超曾述及这种繁琐科考的严酷性:“邑聚千数百童生,拔十数人为生员;省聚万数千生员,拔数百人为举人;天下聚数千举人,拔百数十人为进士;复于百数十进士,拔十数人入于翰林。”^③可见,跻身翰林院,难关重重,实属不易。毫无疑问,经过如此这般过五关斩六将的翰林,皆为熟读四书五经,精通八股时文的儒士。他们中的大部分往往因循守旧,目空一切,不能容忍更不用说接纳外面精彩世界的新鲜事物。但是,凭藉翰林出身这一“最正牌、响亮的资格”,他们通常享有与众不同的升转进用之途,及各项独特优遇。

① ② 容闳:《西学东渐记》第 101、104 页,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。

③ 梁启超:《各省上皇帝书》,《饮冰室文集》卷三。

然而,吴嘉善虽为翰林,却与众不同,对一切应有的功名利禄,没有兴趣。他“不赴征辟,屡辞荣禄,高尚厥志,超然物外而反以西法影像游戏人间。”^① 并出人意料地努力学习外语(西方诸强语言),成为晚清第一位学习外语的翰林。这不啻颇具超前意识的惊人之举。事隔数年后,才出现冯桂芬、郭嵩焘等建立外语学校,培养外语人才的言论。而清政府意识到设立外语学堂是“中国自强之道”,“绥靖边陲之原本”时,较吴氏落后将近十年的时间。但即使这样,创办同文馆还遭人非议,不能一蹴而就。由此可见,在盛行“以夏变夷”观念的社会历史氛围中,吴嘉善敢率先冒天下之大不韪,身体力学夷言夷字,确实思想开明,勇气、胆识有过人之处。

究竟吴嘉善学习的是何种外语,其学习动机又怎样? 缺乏史料,不便妄加揣测。但是他学习的方法和成效却有据可查:“吴子登太史口不能作西音,列西字以华音译读,是为奇法,其忆悟亦属异禀,非人人所能学也!”^② 誉美之辞溢于言表。然而,更令人惊讶的是,他“虽不通其语言,然竟能翻译,其于化学、算术、机械皆得之文字中。”^③ 此外,吴嘉善还嗜好畴人之术。在京师,他“获交乌程徐庄愍公,同治算学。”徐庄愍公即清末著名算学家徐有壬(字君青,浙江乌程人。精通推步、割圆、堆垛之术,著有《务民义斋算学》、《弧三角拾遗》、《堆垛测图》、《四元算式》等)。吴嘉善与他师友相从,共研数理,获益良多。后来,吴嘉善回想起这段美好的时光来,还一往情深,对徐充满敬意,有感恩知己之语。确实,追随徐氏习算而具备的深厚功底,为吴嘉善南行从事畴人之术奠定了必要的基础。

居京师期间,吴嘉善能够以令人称羡的科举正途出身,抛却功名利禄,致力于自己的兴趣爱好——习外文、治算学,真不愧是一个有头脑、有魅力的奇人。难怪狂士王韬令心悅诚服地称赞他是“古之所罕,今乃仅见,求之儒林岂可多得”的人才。^④

1855年,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入赣,连克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余县。吴嘉善因有老母在家,风闻消息,心急如焚,连忙离京南下,“奉母避寇游四方”。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,蒙受“北狩”耻辱的咸丰帝,为维持其岌岌可危的江山,下达“诏求交涉才”谕旨,延纳外交人员。时有吏部尚书陈孚恩上疏举荐吴嘉善:“翰林院编修吴嘉善能识夷字,且通晓各国文义。据江苏臬司汤云松言之甚详,明春办理洋务若有此人,则汉奸不能从中播弄,且使外夷知我朝文学之臣有通知四夷事者。可否明降谕旨飭令来京供职,因汤云松与吴嘉善同系南丰人,知其现在何处也。”^⑤ 皇帝当即“明降谕旨,令吴嘉善来京供职,著薛焕传飭汤云松,查明该员现在何处,即催令来京,毋得延缓。”^⑥ 但是,行孝事亲,养志终身的吴嘉善,“力请当道,陈情有母在,不就也。”^⑦ 这样,在赴美之前,他“从未得政府之特别差委。”容闳在自传里有意提到此事,却不知其中还另有一番波折。

从算学大家到汉文教习

吴嘉善离京南下后,带同老母辗转迁徙至长沙居住。从此开始其为时十余年的畴人之旅生涯:他以算学会友,多方结交当时的治算专家,与他们互相往来,切磋算学问题。这期间,吴嘉善的算学著述颇丰,达二十余种之多,其中绝大部分被收入《白芙堂算学丛书》内,留诸后世。

在长沙,吴嘉善结识了一位研究象数、不求闻达的同道丁取忠。丁取忠,字果臣,号云梧,曾应湖北巡抚胡林翼之聘入幕校书。他“少喜步算,地僻不能得书,持筹凝思,寝食俱

① 王韬:《弢园尺牋》卷六,第8页,台湾文海出版社。

② 曾纪泽:《使西日记》,第1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。

③ 赵惟仁:《南丰县志》卷十八,第17页。

④ 王韬:《弢园尺牋》卷六,第18页。

⑤ ⑥《筹办夷务始末》(咸丰朝)卷七十,第29—30页

⑦ 赵惟仁:《南丰县志》卷十八,第17页。

废,垂四十年。故其学冥搜力索,暗符先哲”。^① 吴嘉善同他接触后,发现“其好(算学)乃过余,所藏算书至广且备,多余生平所未见者。时从假观,因与上下共议论。”^② 他们时常往来,探究各种算学难题,成为算学知交。丁取忠回忆道:道光壬辰年间,余始习算,友人罗洪宾曾以难题见问,久无以应。同治初年,获交南丰吴君子登太史,承蒙教授开屡乘方法,乃知用其术解答昔日难题。后吴君游粤,自己仍然请教官题,但尚有不少窒碍不通之处,经吴君再示以指数表及开方式表,才茅塞顿开,恍然领悟,撰成《栗布演草》一书。据此看来,信息较差的丁取忠在吴嘉善的指点下,弥补了各方面缺陷,学识进步显著。

大概是出于感激和敬佩之情,丁取忠有报恩之举。同治二年(1863年),他不惜耗尽家资刊刻吴嘉善的论著十七种,取名为《白芙堂算学丛书》。吴嘉善作序云:“余与长沙丁果臣皆无他嗜好,而甚癖于此,既忘其癖,更欲以癖导人,……因商榷述此,取其浅近易晓者,以为升高行远之助。”^③ 字里行间表露出二人学深志远,以推广、普及算学为己任的旨趣。“是书初用活字印行十七种,皆于登先生因问随书以示取忠者,先生不欲没取忠微劳,别时嘱印行必署名同述。”丁取忠难却其盛意,署名二人同撰。

1871年,丁取忠以昔年胡林翼所赠买书钱,将该书再次刊刻出版,并增补吴嘉善未刊著述四种,合成“算书二十一种”。这21种分别是笔算、今有术、分法、开方术、平方术、平圆术、立方立圆术、勾股术、平三角术、测量术、方程术、天元一术、天元名式释例、天元一草、天元问答、四元名式释例、四元草、差分术、弧三角术、盈朒术、方程天元合释(后四种系首次刊行)。再版后,丁取忠删去己名,“仍改先生专名,以示不敢掠美。”

其实,吴嘉善的论著还远不止这21种,在《算书二十一种》的凡例中,丁取忠说:“先生原书廿余种,其中《缀术补》等书,其理较

深,未易猝得要领,不敢卤莽付梓。”由此可知,吴嘉善并非容闳所谓“闻其人好研究化学,顾所研究亦殊未见其进步”的等闲之辈,^④ 而是个成果丰硕、名正言顺的算学大家。他的书理论深奥,术多例少,初学读者颇苦其难通。丁取忠虽有意增益,可“其书已成器,无少罅漏,不能羸入,”只好“取术难者,于各种后依术各补一草,……庶读者易于领解焉。”^⑤

1863年,吴嘉善离开长沙继续南行,到达广州。在那里,他认识了鼎鼎大名的邹伯奇(字特夫,广东南海人。著有《春秋经传明考》、《仪象考成绩篇》、《测量备要》、《格术补》、《乘方捷术》等)。通过邹氏,吴嘉善又结交夏鸾翔(字紫笙,浙江钱塘人。著有《洞方术图解》、《致曲术》等)。三人志同道合,相得益彰,在晚清算学史上各据有相当地位。夏鸾翔去世后,吴嘉善为其辑录、整理《致曲图解》、《万象一原》等遗稿。

逗留广州时,吴嘉善还被聘为汉文教习,在广州同文馆任教。先是面对“华夷混一”的新格局及中外交往发展的现状,清廷部分统治者认识到翻译人才之不可或缺,感受到“欲悉各国情形,必先谙其言语文学,方不受人欺蒙,”^⑥ 及“中国与洋人交接,必先通其志,达其意,周知其虚实诚伪,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。”^⑦ 否则夷人居间偏袒捏造,弄虚作假,通事从中播弄是非,谋取私利,只能构成“洋务之大害。”有鉴于此,清政府把培养可靠的翻译人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,先后批准设立京师同文馆、上海广方言馆。随即同治帝又以“中外交涉事件,则广东、上海为总汇之所”的

① 王钟翰点校: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三,第6068页。

② 吴嘉善:《借根方勾股述草·序》,丁取忠编:《白芙堂算学丛书》48种。

③ 吴嘉善:《算学廿一种·序》,同上。

④ 容闳:《西学东渐记》第101页。

⑤ 丁取忠:《算书廿一种·凡例》。

⑥ ⑦ 《筹办夷务始末》(同治朝)卷八,第30页;卷十四,第2页。

实际情况,飭令广州将军库克吉泰、两广总督晏瑞书仿照办理广州同文馆,规定招收的生员应该“资质聪慧,年在十四岁内外,或年在二十左右而清、汉文字业能通晓,质地尚可造就者”,聘用的汉文教习,必须选择“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。”^①。

广州方面,接到上谕后,即刻付诸行动:拟章程、纳生员,聘教习,……于1864年7月3日,正式开馆,广州同文馆“延清汉文教习一人,西文教习一人,取能通算学,有裨西学之实用者。”吴嘉善“品行端洁,文理优长,”^②被视为汉文教习的最佳人选,得到聘用。他是清末三大学馆——京师同文馆、上海广方言馆、广州同文馆约四十年历史中,唯一翰林出身的教习。广州同文馆开办四年后,吴嘉善因教有成效,受到总理衙门的褒扬和奖励。^③可见,他虽然降尊屈驾为一微不足道的教习,尚能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地担任教学工作,为清政府培养出一批忠实可靠的翻译人才。

“留学界之大敌”辨析

十九世纪七十年代,随着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,各种军事工厂和民用企业大量兴办起来,洋务人士日益认识到单纯依赖洋匠的诸多弊端和不尽人意处。为了能够做到“自相授受,并非终用洋人”,他们萌生了派员前往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的想法。“伏思购买外国船炮,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,……流弊原多,诚不若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之便。”^④不过,囿于认识世界的水平,他们提不出可操作性的具体办法,而难继下文。直到1870年,留美归来的先进知识分子容闳,利用协助曾国藩处理“天津教案”的机会,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曾国藩述及他酝酿多年的派遣幼童留美计划,引起了曾的兴趣,并在曾的支持、帮助下,得以顺利实施。

但是,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希望培养出一批思想守旧,能够为洋务运动效力的科技、外交人才,以为维护其统治服务。因

此,在驻洋肄业局的人事任命上,颇动了一番脑筋,作别有用意的部署。容闳熟悉洋情,通晓外语,须依赖他打开局面,负责幼童的安置、入学、上课等问题。可他有个缺点——“汉文未深,又不甚识大体”,清廷担心他把幼童引上西化歧路,为人作嫁,而使派遣目的落空,遂只任命他为副委员,上另设中学较深的正委员全权决定洋局的一切事宜,防止他僭越权限,擅作主张。

驻洋肄业局维持9年,先后有4任委员出掌局务:1872—1875年,陈兰彬(字荔秋)任委员,容闳任副委员,但从1873年冬起,陈被派往古巴调查华工遭凌辱的问题,并参与议办“古巴华工章程”,“以致照料幼童未能兼顾。”^⑤局务实由容闳一人管理。1875年5月,李鸿章奏派区澐良为驻洋肄业局委员,容闳仍充副委员。1878年冬,区澐良被调回工部当差,容闳也因被命为驻扎美、日、秘三国副使,“呈请交卸驻洋肄业局务。”^⑥这样,在驻洋肄业局教习汉文七年的容增祥受命为第三任委员,全权负责留学事宜。不久,他丁忧回国,委员一职由吴嘉善继任。吴氏1879年因“丧母阙入都”,便被委会选涉重洋总办驻洋局直至1881年留学生被裁撤回国为止。赴美时,吴嘉善已年满六十。他以花甲之年出膺此职,乃“纯甫(容闳的号)所推荐,而荔秋所奏调也。”^⑦

但在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一书中,容闳却指出吴嘉善是1876年,陈兰彬特意举荐去接替区澐良的。接下去更有板有眼地刻划出“留学界之大敌”吴嘉善的丑恶面目:揭露他因对曾国藩、丁日昌怀有敌意而不遗余力地破坏曾、丁二人的新政事业——幼

① ④《筹办夷务始末》(同治朝),卷十四,第5页,卷十五,第33页。

② ③《洋务运动》(二)第107、113页。

⑤《洋务运动》(二),第161页。

⑥ 高时良编:《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第877页。

⑦ 李鸿章:《译署函稿》卷十二,第7页。

童留美事业；声讨他是冥顽不化的守旧派，一向视驻洋肄业局为离经叛道的象征，极欲将这眼中钉、肉里刺剔除而后快；罗列他兴风作浪，对驻洋局和留学生吹毛求疵的种种卑鄙手段。^① 这些指认，无形中冠以吴嘉善幼童留美计划夭折不可饶恕的责任者的罪名，从而使他沦为人们口诛笔伐的牺牲品。

确实，中国留美幼童在吴嘉善任内被裁撤回国的，他是应该担负相当责任。但如果将一切后果都归诸他一人承受，指斥他为一手破坏幼童留美计划的罪魁祸首，则实在让人不敢苟同。

派遣幼童留美，“固属中华创始之举，抑亦古来未有之事。”一开始，就遭到国内士大夫的强烈反对，“或谓天津、上海、福州等处，已设局仿造轮船、枪炮、军火、京师设同文馆，选满汉子弟，延西人教授，又上海开广方言馆，选文童肄业，似中国已有基绪，无须远涉重洋”。^② 他们认为“在中国假蒙养书院，烦费少而多成材。”这种论调表达出当时国内大部分士大夫的心声，形成一股反对派遣留学的强大阻力。虽然在奕訢、曾国藩的坚决支持下，遣派留学计划顺利实施，但由于缺乏稳固、坚强的后盾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便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各种问题渐露端倪，致使不信任驻洋局和留学生的人士越来越多，甚至连曾纪泽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也不例外，“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，遽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，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，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，于国家无大益。”另外，“出洋局赴美者，其收效固不如同文馆学生与福建船厂学生，上海机器学生收效多也。”^③ 由此可见。反对派遣留学，是当时士大夫们的普遍心态，不单是顽固派散布流言，诋毁破坏，就是讲求洋务的趋新人士也满怀疑虑，多有微词。可以说，这种种不利的舆论导向，早已给留美幼童的前途蒙上一层沉重的阴影。

再就驻洋肄业局来说吧。除容闳外，也并

非只有吴嘉善一人“敌视”留学事业。吴嘉善和陈兰彬、区澐良、容增祥三人都是较早走出国门的传统知识分子，应该说是一批开明者。他们之受命管理留美幼童，显然是深得清政府信任的。因此，他们的耿耿忠心便是秉承清政府旨意，督促幼童们在“功夫要紧学习”的基础上，还要尊君亲上，“守祀孔之礼”，企图把他们调教成能为洋务新政效力但又循规蹈矩的科技、外交人才。一旦他们觉察到幼童们跨越传统圣训的雷池，步入异质文明的轨道而仓猝之间难以收勒时，便不约而同地采取明哲保身的办法：迅速上报清政府，故意夸大幼童们的越轨之举，尽量开脱自己，避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于是，出现了委员们联合起来揭发留学生和驻洋局不可信赖的怪现象。陈兰彬上奏说，留学生“外洋长技尚未周知，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，已大失该局之初心。”容增祥也拜谒李鸿章，证实“学徒抛荒中学，系属实情。”区澐良则通过刘坤一向奕訢“条陈局中利弊”，陈兰彬不失时机地附和道“该局利少弊多，难资得力。”清政府知悉后，大为震惊，命令李鸿章、刘坤一、陈兰彬等整顿局务，严加约束留学生，以免滋生流弊。^④ 这样，在委员们众口一词的“出卖”下，留学生们“一一悉遣归”的悲剧结局指日可待。

吴嘉善系四名正委员中唯一的翰林出身，尽管有胆有识，但毕竟久受传统思想和旧礼教的侵蚀，摆脱不了封建圣道的束缚。面对留学生们的诸般离经叛道行为，同其它委员一样，无法容忍。1879年，他接管驻洋肄业局后，便“叠称局务流弊孔多，亟宜裁撤。”结果受到李鸿章的指责：“以为悉数可撤，未免过于固执。”^⑤ 李指出驻洋肄业局“十数年来费用已数万元，一旦付之东流，亦非政体”，主张

① 容闳：《西学东渐记》第106—107页。

② 高时良编：《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第868页。

③ 曾纪泽：《使西日记》第29页。

④ 《洋务运动》（二），第166页。

⑤ 李鸿章：《译署函稿》卷十二，第7页。

半留半撤之法。

后来,不知什么缘故,吴嘉善改变了初衷,也提出半留半撤的建议,具体办法是:“将已入大书院者留美毕业,其余或选聪颖端恣可成材者酌留若干,此外逐渐撤回,若使署可以兼顾,其肄业局总办、教习、翻译人等,可酌裁省费。”^①李鸿章十分欣赏,认为此法“既不尽弃前功虚糜帑项,亦可出之以渐,免贻口实”,不失为审时度势之论。陈兰彬本来支持吴嘉善的全裁之议,当他得知吴产生了变计,非常生气,便以年老多病为由,向清政府提出不复经理驻洋肄业局事宜的要求。李鸿章以为陈兰彬身为公使,资望权位最优,此时必需他“综其大纲,既量实可靠,亦事势不得不然。”^②由是观之,吴嘉善在留学生去留问题上没有多发言权,根本不能作主。而陈兰彬虽有生杀予夺之权,但是他“求退甚切”,不想过问驻洋局事务。这样,容闳的意见便显得比较重要了,但一向将留学教育计划“视为最大事业,亦报国唯一政策”的容闳,却并没有独排众议,力挽狂澜。他致函吴嘉善,“有分数年裁撤之说。”^③同意留学生半留半撤的方案。

1881年,李鸿章抽调20名学电报的留学生回国听候分派,奕訢认为此举乃“不撤而撤之意”,指出“与其逐渐撤还,莫若概行停止,较为直截。”并上奏请求“趁各局用人之际,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。”^④得到了批准。于是,留学生们被迫中断学业,凄然回国。

但是,容闳在自传里却有意隐瞒事实真相,猛烈抨击吴嘉善,把驻洋局的解散归诸他上下运动、多方发难的结果,企图藉此嫁祸于他一人,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。实际上,容闳这么做只能欲盖弥彰,反而暴露出他的真正意图,没有达到他移罪于人的目的。

留美幼童中途裁撤的原因十分复杂,并非谁能够一手操纵的,任何将之归罪于某个人的做法不仅有失公允,而且难以令人信服。因为派遣留学同其它洋务事业一样,是清政府面临千年变局的危急关头,被迫采取的“两权相害取其轻”的一种新举措,缺乏周密部署和长远考虑,更谈不上全盘规划的意向。这就注定了它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。由此,可以说正是清政府那种急功近利、鼠目寸光的短视决策,才一手酿就留美幼童的悲剧性下场。

综上,指控吴嘉善是“留学界之大敌”、破坏幼童留美事业的罪魁祸首等论说不仅荒谬可笑,而且难以立足。

吴嘉善回国后的去向因缺乏史料,只得付之厥如。他约卒于光绪十一年(1885年),终年66岁。

(作者单位: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;
责任编辑:齐国华)

① 《洋务运动》(二),第179页。

② 李鸿章,《译署函稿》卷十二,第7页。

③ 《洋务运动》(二),第166页。